

外交评论 2014 年 第 6 期

DOI:10.13569/j.cnki.far.2014.06.016

超越地缘政治的迷思： 中国的新亚洲战略

钟飞腾

摘要 地缘政治探讨地理因素与国家间权力兴衰的关系。由于英美霸权相继主导国际体系的发展，麦金德式的、以均势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思想体系成为主导范式。在整个 20 世纪的地缘政治舞台上，欧洲是争夺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亚洲只是边缘角色。但 21 世纪初始，中印崛起引领亚洲崛起，这一区域的权力增长和变迁引发了美国的担忧，美国同盟体系以麦金德的“枢纽”为核心推动“印太”战略，试图压制中国。但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美国同盟体系中的东亚盟国实力地位下降，亚洲的地缘政治经济中心正在经历从东向中心的偏移，特别是中国正向着亚洲中心位置回归。中国基于共同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积极推进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亚洲国家的发展战略，适应区域内国家的多重战略目标。中国的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新视野，超越了以压制挑战者为特征的霸权国家的地缘政治思维。

关键词 地缘政治 中国崛起 新亚洲战略 一带一路 印太

亚洲崛起与 20 世纪后半期地缘政治调整紧密相关，而中国崛起将地缘政治因素更强劲地注入了有关“亚洲世纪”的讨论。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相对衰落的态势下，中国根据全球政治经济变革的新形势提出了一些新主张，比如亚洲新安全观、“一带一路”建设等，谋划中国和平发展的新地缘。美国因应亚太的新形势也提出了新的全球战略，无论是从“枢纽”到“再平衡”，还是新近提出的“印太”战略，都反映出美国国际政治思维中根深蒂固

*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的均势理念，而这种均势理念又与地缘政治有着深厚的渊源。在西方舆论看来，新一轮大国关系调整明显带有地缘政治的色彩。^①

地缘政治探讨权力与地理的关系，类似于牛顿“万有引力”模型距离和力量呈反比的特质，在国际关系意义上权力也随距离增大而减弱。^② 地缘关系是导致崛起国和霸权国地缘战略差异的一项重要因素，霸权国始终要寻找影响自身权势地位的崛起国身处何方，对于距离遥远的力量中心崛起，霸权国需要消耗更大的成本才能压制，而管控周边地带的力量发展则相对容易许多，因而实现同样的战略目标所要付出的成本随地缘而变化。对于崛起国而言，不仅需要讨论霸权国的权力如何通过地理关系影响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也要通过调整国内因素来进一步促进权力生产和发展。

中国的国际政治战略并不缺少地缘考虑，但需要超越以均势为基础的西方思维，更加注重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培育权力、扩大权力，而不仅仅是破除阻碍本国实力增长的外部因素。内外平衡构建地缘战略对于确保崛起的稳定性至关重要。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亚洲视野仍然将共同发展置于核心地位，努力拓展覆盖全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中国的国内发展经验延伸至周边，唤醒周边国家的历史记忆，打造基于共同发展理念的命运共同体。

一、地缘政治与国家兴衰

地缘政治学说具有不同的国家属性特征，也因缘起国不同的发展历程而呈现出兴衰之态。在当前流行的有关学说中，德国地缘政治学和英美地缘政治学是两大思想流派。^③ 德国地缘政治学随着 1945 年德国战败和 1946 年其代表性

^① 因乌克兰事件引发的美俄冲突以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升级，关于“地缘政治回归”命题的争论成为 2014 年的显著特色，伊肯伯里认为自由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中俄不是世界秩序争论的参与者，而沃尔特·米德则认为中俄与伊朗一道形成了一个轴心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冷战结束初期所谓“地缘政治终结”和“历史终结”的乐观情绪已消失殆尽。参见 Walter Russell Mead,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The Revenge of the Revisionist Powers”,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3, May/June 2014, pp. 69-79; G. John Ikenberry, “The Illusion of Geopolitics: The Enduring Power of the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3, May/June 2014, pp. 80-90.

^② “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应用广泛，其一般含义是双边贸易投资额与距离呈反比。可参考 James E. Anderson, “The Gravity Model”,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1, pp. 133-160.

^③ 也有学者认为还存在一个法国地缘政治学流派。参见吴征宇：《地理政治学与大战略》，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年，第 7—12 页；〔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年，第四章。当然，如果把二战期间日本有关地缘政治的论述加进来，名单还将继续扩大。

学者卡尔·豪斯浩弗去世而终结。^①但地缘政治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美国政治家的地缘平衡战略又开始复活,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影响力。^②地缘政治学的命运往往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德国崛起时发展出地缘政治学说,英国、美国霸权衰落时也探究地缘政治发展规律。明晰地缘政治学说兴衰因素,对于探讨中国的地缘政治定位以及从地缘政治角度考察中国的未来发展趋势意义重大。

地缘政治作为一种思考国家间权力关系的方法与思想兴起于19世纪末期。据考证,“地缘政治”(Geopolitik)一词于1899年由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创造。^③契伦认为国家有独立的目标和动力,在国际舞台上不仅仅是法律主体,也是土地和人民不可分离的、活生生的具有灵魂的生命体。尽管从学术意义上说,契伦缔造了后世流行的“地缘政治”术语,但他的相关论著在其1922年去世后很长时间内并未翻译成英文,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地缘政治思想源于日渐崛起的德国。

德国人提出有关地缘政治的论述,着眼点是采取何种政策让德国发展壮大。与契伦的学术际遇不同,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关于“政治区”的相关论述早在1897年就被译成英文。拉采尔认为,空间是一种政治力量,应该从权力角度而不是从自然地理意义上加以评估,反之亦然。^④拉采尔判断,国家的规模随着不断征服变得越来越大,领土越大的国家越安全,德国的命运就是要不断获得新的领土。^⑤契伦和拉采尔都主张德国和瑞典建立某种更加强大的联合体,而拉采尔关于“生存空间”的论断在后世也广为人知。

国家有机体论为更改边界提供了合法性,这必然影响到当时的霸权国英国的利益。19世纪,英国以自由主义为立国之基,希望全球都向英国开放。与主导英国大战略的经济自由主义不同,19世纪后期德国的所有学说都带有为德国崛起背书的烙印,德国地缘政治学说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重商主义、俾斯

① Leslie W. Hepple, “The Revival of Geo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Supplement to Vol. 5, No. 4, 1986, p. 522.

② 典型如美国记者和地缘政治分析师罗伯特·卡普兰的系列论述, http://www.robertdkaplan.com/robert_d_kaplan_bio.htm。其2012年的论著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被译为《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并不能准确反映其论著主旨。〔美〕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涵朴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Robert D. Kaplan,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③ Ola Tunander, “Swedish-German Geo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Rudolf Kjellén’s ‘The State as a Living Organ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3, July 2001, pp. 451-463.

④ Friedrich Ratzel, “Studies in Political Areas. II. Intellectu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Large Area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 No. 4, January 1898, pp. 449-463.

⑤ Friedrich Ratzel, “Studies in Political Areas. The Political Territory in Relation to Earth and Contin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 No. 3, November 1897, pp. 297-313.

麦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①都致力于发展德国的国家利益，为德国争夺势力范围寻求合法性。在当时的德国人看来，领土空间是确保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首要问题。用武力解决领土问题，不只是拉采尔一人的看法，也是19世纪后半期国际社会的普遍规范。但对英国来说，以武力争夺的后果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衰落，特别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模式的衰落，这一深远影响直到一战结束后才被认识到。

与德国精英要求德国崛起一样，美国人同样也认为天佑美国。但美德两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截然不同，这不仅影响到两国的命运，也塑造着各自学者构建的学说。与拉采尔同时期的美国学者有两类关于如何拓展美国势力的学说，一个是以马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意义上的海权论，另一个虽较少受到国际关系学者注意，但在美国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在19世纪90年代发展出一套“边疆论”，认为正是美国人的边沿身份塑造了一个共同的国家身份，这种国家认同为美国向西拓展奠定了基础。就拓展国家边疆和塑造新的国家认同而言，特纳的学说和拉采尔的区别并不大，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马汉的海权论。有论者认为，马汉认同帝国主义论，但其实现方式与欧洲国家不同，马汉总结自罗马时代以来海权发展的学说，特别是借鉴了英国的强盛之道，其海权论强调集海军发展、海上贸易和开放市场为一体。马汉学说最重要的地域背景是中美洲国家联合对抗美国在拉美的权力扩张，为了压制地区力量的反弹，马汉主张美国建立若干个军事基地。结果马汉学说甫一面世就影响了当时的决策者，如麦金莱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海约翰国务卿等人。^②

面对欧洲大陆强权崛起，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了基于均势的地缘政治学说。在1904年的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麦金德提出了三个主要判断：第一，“由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主要的政治效果是把欧洲与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第二，由于蒸汽改进与航海技术发展，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第三，俄国的扩张将对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麦金德担心，对英国最大的威胁来自未来德国和俄国的联合。^③为此，在1919年的著作《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麦金德进一步将“心脏地带”拓展为包括亚欧和非洲的“世界岛”概念，并发展出著名的三段论，即控制东欧到心脏地

^① 据考证，“Realpolitik”一词首次见于德国思想家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冯·罗朝(Ludwig August von Rochau)1853年的著作《现实主义政治原则》，后来指代俾斯麦的国务政策。参见John Bew, “The Real Origins of Realpolitik”,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April 2014, pp. 40-52.

^② Greg Russell, “Alfred Thayer Mahan and American Geopolitics: The Conservatism and Realism of an Imperialist”, *Geopolitics*, Vol. 11, No. 1, 2006, pp. 119-140.

^③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8页。

带再延展至世界岛的逻辑判断。^① 后人皆以为麦金德预见到冷战美苏对立，但麦金德给英国开出的地缘政治解决方案，却是将东欧分裂成几个独立的小国，隔离德国和俄国。显然，美苏在冷战中并没有完全采纳这一主张。尤其值得今天的读者注意的是，麦金德在1904年认为，“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② 显然，美国在麦金德的势力均衡地缘战略中并没有占据首要位置。

据说麦金德自己并不乐意被视为地缘政治学家，而更愿意被归为政治经济学家。麦金德对地缘政治的思考主要源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政治经济现实，并未预见到美国崛起给后世带来的巨大影响，其著作在战争期间也没有受到美国重视，但却得到了德国人的赏识。麦金德死于1947年3月6日，6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救援希腊和土耳其。按照一位学者的概括，推动麦金德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被霍布斯鲍姆称作“帝国主义时代”（1875—1914）的时期，有四个新特点极为突出：第一，第一波全球化改变了国家使命，从领土征服转向获取较高的相对效率，而后者正是英国当时难以解决的问题，麦金德主张限制居民和资金移出；第二，英帝国的衰落远远快于其竞争对手的崛起，为此麦金德倡导关税和帝国特惠制，但并不重视美国崛起的机会；第三，新技术和新的全球生活标准使得社会组织形式至关重要；第四，20世纪初的英国已经由于城市化而变成了工业社会，但统治精英和治理方式仍然是旧式的。^③ 由于这四类问题，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方案并不足以重振英国霸权，仅调整外部地缘政治关系无法解决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说，英国的政治经济实力不足以实现麦金德的方案，地缘政治理论和政治现实之间产生了“麦金德悖论”。^④

20世纪70年代，因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推动，“地缘政治”在政策层面开始重新赢得社会和政治支持。基辛格1979年出版的《白宫岁月》一书到处使用诸如“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地缘政治的利益”、“地缘政治的现实”、“地缘政治的挑战”、“地缘政治的雄心”、“地缘政治的结果”等表述。由于基辛格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尼克松总统频繁在演讲中提到地缘政治，美国的精英读物如《时代》、《新闻周刊》、《福布斯》、《新共和》等也大量使用“地缘政治”一词。特别是美国凭借联合中国抵抗了苏联的进攻后，地缘政治作为一种

① [英] 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4页。

② [英] 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1页。

③ Gearóid ó Tuathail, “Putting Mackinder in His Place: Material Transformations and Myth”,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1, No. 1, January 1992, pp. 100-118.

④ 张文木：《“麦金德悖论”与英美霸权的衰落——基于中国视角的经验总结》，《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1—15页。

恢复均势的方法赢得了国际声誉。^①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地缘政治话语的复活与中国的地缘战略有关。中国从改革开放初始，就被镶嵌在一个地缘政治复活构成的话语世界中，中国改善对美关系改变了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政治家可以创造或者复活一套政治话语体系，几乎所有在地缘政治学说上产生影响的理论家，同时又是该国活跃的政治人物，契伦、拉采尔、马汉、麦金德概莫能外，而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也同样如此。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地缘政治学更是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一种旗帜、多种含义”，认为地缘政治复兴以来出现了四种流派，分别是作为地缘战略的新古典地缘政治、一切都是地缘政治的颠覆性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的政治地理学、批判性地缘政治。^②但真正受到重视且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仍然是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人代表的“新古典地缘政治学”（neoclassical geopolitics）。^③地缘政治的含义是多样化的，但与权力的紧密关系是几乎所有地缘政治学流派的核心所在。

从地缘政治学说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可以将地缘政治学划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大类。19世纪后期的德美两国都属于崛起国，其地缘政治学说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从既有的国际体系中崛起，但德美两国基于地缘政治环境开出的药方是不同的；而英国的地缘政治学说则服务于如何捍卫英国霸权，二战后美国的地缘政治学说向英国传统回归，也是捍卫美国霸权、防止美国霸权衰落，基辛格复兴地缘政治学说乃是从麦金德的实力均衡出发，目的和手段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说，麦金德的陆权概念是防御性的，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也是防御性的，即为了捍卫霸权，需要控制某一区域。但控制这个区域本身并非美欧力量增长的源泉，美欧力量增长来源于其民主制、科技创新以及西方阵营内部的交换。而德国乃至日本的一些地缘政治概念，显然多了进攻性色彩。相比于英国，德国、日本当年都属于后发世界的一员，发展“生存空间”学说含有寻求崛起合法性的意义，当代很多寻求更大程度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也需要这类学说，但必须考虑地缘政治环境的可塑性。

在通过地缘政治运筹提升权力这一点上，这些学说基本一致。提升权力，既可以通过调整国内手段，比如麦金德对英国困境的分析很多时候基于国内自然禀赋和调整国内矛盾，也可以通过国际政治经济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比地缘政治运作更重要的是本国能否首先通过国内调整提升权力。其次才是地缘

^① Leslie W. Hepple, "The Revival of Geopolitics", pp. 525-526.

^② V. D. Mamadouh, "Geopolitics in the Nineties: One Flag, Many Meanings", *GeoJournal*, Vol. 46, No. 4, 1998, pp. 237-253.

^③ Alexander B. Murphy, "Is There a Politics to Geopolitic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8, No. 5, 2004, pp. 619-640. 特别是其中马克·巴辛（Mark Bassin）关于当代地缘政治学两张面孔的论述。

政治上的首要任务，即判断某个区域本身是否具有权力属性上的重要性，然后通过技术分析研判影响这一区域权力地位的其他可能区域。就此而言，心脏地带属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第一层次概念，而通过资源、通道、技术、资金输入或者输出改变某个区域的重要性，都属于第二层次的概念。因此，理解地缘政治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权力，特别是如何认识某个区域、国家的权力兴衰。

二、“枢纽”与“印太”地缘战略

在地缘战略谋划上，美国崛起依靠海权。马汉的学说塑造了美国的海洋国家特性，站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分析美国霸权的地缘战略时须牢记，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分析的时间节点是1660年至1783年，即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前的崛起之路。^① 借鉴英国崛起之道，马汉强调美国要支配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确保美国通向亚太，但21世纪美国海权战略与马汉时代迥然不同。^② 二战后美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全球霸主，其国际战略更多从欧亚大陆列强争霸的历史中汲取养料。正如一位论者指出，美国政府和学术界有关欧洲地缘政治的代表性论述都出自战后的欧洲移民之手。^③

在分析潜在挑战者时，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不是马汉的海权论而是麦金德的学说。从实践结果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步验证了麦金德的理论。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地缘战略，贯穿着一条“麦金德-斯皮克曼-凯南”线索。斯皮克曼在《和平的地理学》一书中明确告诫美国，“在和平时期就要确保旧大陆的两个区域不被一个国家或数个国家构筑成的联盟所统治”。基于美国卷入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将有可能被一个单一的强权所统治”，斯皮克曼认为“心脏地带的重要性已经不及边缘地带”。^④ 但无论是麦金德还是斯皮克曼，其基本的国际政治理念仍然是均势，而均势从来都是西方特色的地缘

① [美]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冬初阳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

② [美] 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钟飞腾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64—265页。

③ Michael Lind, “A Neglected America Tradition of Geopolitics?” *Geopolitics*, Vol. 13, No. 1, 2008, p. 181.

④ [美] 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论》，林爽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48、60、62页。其英文版为 Nicholas John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4.

大战略。^① 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是斯皮克曼-麦金德学说的一项具体应用。例如，1988年里根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就表示：“如果一个敌对的国家或者一群国家支配欧亚大陆——这一区域通常被称为世界的核心地带，那么美国最为根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就处于危险之中。”^② 美国地缘政治战略运用最成功的案例是击败了苏联这个挑战者，而这个经验对美国战略思维的影响堪比麦金德学说对英国的影响。

从霸权者的角度来看，21世纪对均势格局影响最大的是亚洲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为了应对这种挑战，2011年底奥巴马政府提出“枢纽”（Pivot）战略，^③ 稍后更改为“再平衡”战略，包括军事再平衡与以TPP为核心的经济再平衡。^④ 美国政府把战略的名称从“枢纽”改为“再平衡”，既为摆脱过分侧重于军事的印象，或者说避免落入因财政危机导致的承诺信用问题，又受到其他地区地缘政治意义变革的影响，比如中东地区再度陷入动荡，美国需要在各个区域之间平衡其投入。但归根到底，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核心，旨在处理亚洲的新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应对中印崛起、旧日盟友相对衰落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继续保持美国对地区内国家的承诺，维护盟友和伙伴国的利益。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原本趋向于一体化的东亚地区，并进一步引发地区内国家的分裂，亚洲地缘政治经济的分化加速。

理解美国政策调整的关键词是“枢纽”。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使用了29次“pivot”一词。该书中译本根据行文背景，将该词分别译为“支轴”、“中枢”。布热津斯基断言：“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辨明冷战后欧亚大陆关键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并为它们提供保护，也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⑤ 布热津斯基认为，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是战略棋手，而英国、日本和印尼

① 相较于《和平的地理学》66页的篇幅，斯皮克曼1942年论述美国战略的大作厚达500页，而其副标题就是“美国与均势”，参见Nicholas John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2。

② Ronald Reaga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88, No. 2133, 1988, p. 2. 转引自Gearóid ó Tuathail, “Putting Mackinder in His Place: Material Transformations and Myth”, p. 100。

③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October 11, 2011, *Foreign Policy*,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④ 美国前贸易谈判专家普雷斯维茨认为TPP是一项失败的地缘政治方案，参见Clyde Prestowitz, “The Pacific Pivot”, *The American Prospect*, Vol. 23, No. 3, April 2013, pp. 40-46。

⑤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英文是“Geopolitical Pivots”，地缘战略棋手的英文是“Geostrategic Player”。

却不具备当棋手的资格，支轴国家则包括乌克兰、阿塞拜疆、朝鲜半岛、土耳其和伊朗，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如地缘战略棋手。在他看来，地缘战略棋手“是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致影响到美国的利益的国家”。^①应当说这个区分对于理解当前美国的战略是有意义的，至少布热津斯基认为，“辨明主要棋手和关键的支轴国家有助于界定美国面临的重大政策难题和预测美国在欧亚大陆面临的潜在重要挑战。”^②美国对付这两类国家的策略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地缘政治棋手，布热津斯基的两个关键词为“操纵和适应”，而对于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则是“管理”。^③

“再平衡”战略在推行过程中，不仅引发美国国内的诸多质疑，也让其盟友担心美国的承诺可信性。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将其理解为“遏制”显得冷战色彩过浓，但如果紧紧抓住“枢纽”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深入分析被美国同盟体系着力推进的“印太”（Indo-Pacific）战略，则能迅速理解美国新一轮全球战略调整的根本思维。

关于“印太”概念的确切起源，各有各的说法。有人认为，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浩弗最早使用这一概念。^④但从 2011 年开始升温的“印太”概念，主要源于美国同盟体系的整体战略调整。

“印太”在澳大利亚的使用和扩散首先源自智库学者，其后被澳大利亚国防部等正式写入政府文件。罗伊研究所的罗瑞·迈德卡夫认为，“印太”是一个正在显现的囊括印度洋、太平洋的亚洲战略系统，其兴起既因中印利益扩张所致，也由美国在两个区域持续的战略作用和存在加以推动。迈德卡夫特意指出，澳大利亚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重视“印太”地缘战略，讨论核威胁以及核武器的传播，提出了“亚洲和印太地区”以及“印太地区安全的英联邦的责任”。那时的“印太”概念就已经涉及中国，因为中国于 1964 年引爆了原子弹。^⑤2012 年 8 月，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斯蒂文·史密斯在罗伊研究所讨论国防白皮书问题时认为，环印度洋地带是一个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地区。在 21

①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 34 页。

② 同上书，第 40—41 页。

③ 英文分别为“manipulates and accommodates”和“manages”，中文版将前者译为“巧妙地处理”，后者译为“打交道”，参见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 158 页。

④ Chengxin Pan, “The ‘Indo-Pacific’ and Geopolitical Anxieties about China’s Rise in the Asian Regional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8, No. 4, 2014, p. 454.

⑤ Rory Medcalf, “The Indo-Pacific: What’s in a Name?” *The American Interest*, Vol. 99, No. 2, 2013,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3/10/10/the-indo-pacific-whats-in-a-name/>.

世纪，被称为“印太”的亚太和环印度洋地区将成为全球战略中心地带。^① 2012年10月发布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明确提出，印度洋已超过大西洋、太平洋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商业通道，战略地位突出。白皮书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看作一个战略极。^②

“印太”概念得以广泛传播也离不开美国的战略部署。2010年10月，希拉里·克林顿在檀香山的演讲中使用了“印太”一词，描述这一新的地缘政治现实，“美国将在印度洋上和印度海军扩大联系，因为美国理解印太盆地对全球贸易和商业的重要性。”^③ 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澳大利亚因文化和地理关系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2011年11月，在澳美新联盟60周年之际，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宣布将把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这一演讲表明美国政府正式开始强力推动再平衡战略。在《美国的亚洲世纪》一文中，希拉里阐述了“印太”这一概念，认为“亚太成了全球政治的关键驱动者，范围包括从印度次大陆到美国西海岸。这一地区跨越两个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通过船只和战略变得更为紧密”。^④ 2014年8月，美澳“2+2”会议签署为期25年的《军事态势倡议》（Force Posture Initiatives, 美方用 Agreement），将达尔文驻军协议法制化。美防长哈格尔表示，与澳大利亚签署的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夯实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深化美国正在推进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将持续推进与印度的关系，并致力于建立一个跨越印太地区的安全体系。^⑤ 自2010年10月希拉里把印度洋纳入美国新政策以来，这是美国对地区安全架构的最新阐述，即构建一个跨越两洋的安全体系。

对美国而言，以“印太”替换“亚太”表明了极为重要的战略调整。长期以来，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管辖着第七舰队，位于中东的司令部管辖着第六舰队。在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官员只负责东北亚、东南亚，南亚次大陆属

① Stephen Smith, “Paper Presented by Stephen Smith MP, Minister of Defence, to the Lowy Institute on the 2013 Defence White Paper”, August 9, 2012, the Lowy Institute, <http://www.lo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paper-presented-stephen-smith-mp-minister-defence-lowy-institute-2013-defence-white>.

②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 October 2012. 关于“印太”与“泛亚”概念的辨析，可参考第74—75页的专栏2.5，关于战略极可参考第232页。

③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marks at Kahala Hotel, Honolulu, October 28, 2010, <http://m.state.gov/md150141.htm>.

④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⑤ “Remarks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Chuck Hagel, Australia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ulie Bishop, and Australian Minister of Defense David Johnston”, August 12, 2014,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4/08/230525.htm>.

于另外一批人。^① 美国构建“印太”安全体系意味着整合分属不同机构的力量。随着中国崛起势头加速，美国的力量增长因为金融危机而暂时停滞不前，甚至在某些领域被大幅度削弱，美国必须提高盟友担负防务开支的比重，并重整内部机构以提高效率。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不仅修复了与传统盟友的关系，也加强了与新伙伴的关系。而“印太”无论是从地理范围还是从美国关注的利益来看，都有利于减轻美国的负担，增强亚洲国家对中国的警惕。

“印太”的兴盛也与海洋安全问题突出相关。近几年来，中美海上竞争的态势日益明显。尽管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都承认一个具有全球性贸易地位的大国、实力不断增长的大国必然发展现代军力，但对于中国如何使用军力仍极为担忧。随着中国加速推进海军现代化，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线安全，以及所谓公海航行自由等国际规则是否遭遇挑战等问题。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美国，都希望美国及其盟友仍然掌握制定海洋规则的权力。对美国而言，与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合作有助于其控制印度洋。

美国霸主地位的维持得益于防止欧亚大陆被“数个国家构筑的联盟所统治”，美国地缘战略的核心任务是防止中印俄结盟，特别是拉拢印度。但印度政府运用的“印太”概念则更加强印度自主性，保持既有对外政策的稳定性，推动印度向东发展，并不愿成为美国的同盟。这一立场与“印太”概念的赞成者或怀疑者都不同。^② 美国、澳大利亚面临着一种困境，既希望继续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又担心中国实力增长后逐渐改变国际秩序。中国崛起进程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国际财富创造和分配的能力更加向亚洲倾斜。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太”显示出美国体系对权力、财富向亚洲转移的重视，美国始终担心中国日益在“泛亚”地区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美国拉拢西太平洋国家似乎忽视了权力在亚洲内部的变迁，特别是东北亚权势地位的缓慢下降，当然这取决于如何定义亚洲，特别是定义中国的位置。^③

① 王缉思曾指出，美国把中国划定为东亚范围，“跟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人谈大的问题，比如阿富汗、印度、中东的问题，对方不关心，也不跟你谈。他老跟你谈中日争端、南海这些搅成一锅粥的问题。”参见王缉思：《中国布局未必要按美国想法来》，《东方早报》，2014年6月20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620/12579624_0.shtml。

② Priya Chacko, “India and the Indo-Pacific: An Emerging Regional Vision”, Indo-Pacific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re Policy Brief, Issue 5,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November 2012, http://www.adelaide.edu.au/indo-pacific-governance/policy/Chacko_PB.pdf#search=Priya+Chacko%2C+indopacific。

③ 王缉思曾一再强调，中国并非一个美国定义的东亚国家。参见王缉思：《东西南北，中国居“中”——一种战略大棋局思考》，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15—30页。

三、亚洲地缘重心的大偏移

以中印为核心的亚洲从 19 世纪后期以来不断衰落，地缘政治重要性也不断下滑。二战结束后印中相继独立，亚洲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上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地缘政治重要性仍然属于第二层次，即亚洲的阵营归属将影响到其他更为重要的区域的地缘政治地位。亚洲经济地位的重新上升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进入 80 年代后世界各地更是涌现出不少关于“亚洲世纪”来临的展望。尽管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一度动摇了世界对东亚的信心，但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危机之后仍在继续增长。亚洲开发银行 2011 年发布的《亚洲 2050：实现亚洲世纪》报告认为，到 2050 年亚洲经济体的 GDP 总量将占世界的 51%。^①

亚洲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上升比较明显，难点在于亚洲的这种上升究竟由哪个板块推动？这涉及如何确定“亚洲”的问题。阿米塔·阿查亚认为，二战结束以来存在四种关于亚洲的概念，分别是帝国主义者的亚洲、民族主义者的亚洲、普遍主义者的亚洲和地区主义者的亚洲，后者的生命力最强劲。^②也有学者认为，亚洲应该被分为海上亚洲和内陆亚洲，海上亚洲应当将连接内陆亚洲和西方作为其地缘政治使命。^③在讨论“亚洲世纪”的发展前景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区域外的学者基本不认同“亚洲世纪”的提法，而亚洲本土的学者则持肯定态度。在否定派看来，亚洲无法像欧洲和北美那样成为一个紧密的地区，缺乏政治影响力，而且亚洲国家在本世纪中叶之前都将面临相当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粮食和水资源压力。^④

亚洲本身是一个从西方舶来的概念，二战后成立的一些国际组织对亚洲的定义也不统一（表-1），这种情形对通过统计来显示某个区域的地缘经济重要性有很大影响。在讨论亚洲重要性时，一项基本工作是明确通行的“亚洲”是什么，或者说找出被大多数机构所接受的亚洲地理共识。

①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 2050: 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1.

② Amitav Acharya, "Asia Is Not On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9, No. 4, November 2010, pp. 1001-1013.

③ Myongsob Kim and Horace Jeffery Hodges, "Is the 21st Century an 'Asian Century'? Raising More Reservations than Hopes", *Pacific Focus*, Vol. 25, No. 2, August 2010, pp. 161-180.

④ 可参考《国际经济》杂志对众多专家的采访，"The Asian Century: Reality or Hype?"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ummer 2013, pp. 8-31.

表-1 各国际组织定义的亚洲

机构	名称	涵盖范围	数量
联合国统计局	亚洲	1) 中亚; 2) 东亚, 加香港、澳门; 3) 南亚, 加阿富汗; 4) 东南亚; 5) 西亚。	50
亚洲开发银行	发展中亚洲	1) 中亚, 加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 2) 不包括朝鲜和日本的东亚, 但有香港; 3) 南亚, 加阿富汗; 4) 东南亚; 5) 太平洋岛国, 加库克群岛。	45
世界贸易组织	亚洲	1) “东亚”, 其成员实际为不包括朝鲜的东亚, 不包括东帝汶的东南亚, 另外加上港澳台、澳新, 以及不包括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瑙鲁、帕劳的太平洋岛国; 2) “西亚” (实际上是南亚加上阿富汗)	3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新兴和发展中亚洲	中国、蒙古, 东南亚, 不包括巴基斯坦的南亚, 不包括瑙鲁的太平洋岛国	29

注: 1) 中亚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 5 国; 2) 东亚包括中国、朝鲜、日本、蒙古、韩国等 5 国; 3) 南亚包括孟加拉、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 7 国; 4) 西亚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塞浦路斯、格鲁吉亚、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阿联酋、也门等; 5) 太平洋岛国包括斐济、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瑙鲁、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群岛、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等。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各机构网站数据整理。

在上述统计口径中, 联合国统计局将“亚洲”分为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等五个区域, 属于标准的地理概念; 亚洲开发银行 (ADB) 的“发展中亚洲”概念不包括西亚, 但纳入了太平洋岛国; 而世界贸易组织 (WTO)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定义“亚洲”时不包括中亚和西亚, 但都包括了一定数量的太平洋岛国。从一定意义上说, ADB、WTO 和 IMF 的“亚洲”概念更接近“亚洲—太平洋”, 反映了日本和美国的地缘战略考虑。从中国角度看, “亚洲”的含义更接近联合国统计局的定义。进一步考虑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 (SIPRI) 在考察各国军费支出时对亚洲的定义 (中亚 5 国、东亚 5 国、东南亚 11 国加上台湾地区、不包括马尔代夫的南亚),^① 那么被大多数国际机构使用的“亚洲”实际上是四个区域: 中亚、东亚 (加上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和南亚 (加上阿富汗)。

根据这一定义,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②, 亚洲占世界 GDP 的比重将从 1980 年的 19.3% 升至 2019 年的 42%。但亚洲内部四个区域的增幅并不相同, 东亚

① 参考该所网站, <http://milexdata.sipri.org>。

② 市场汇率算法主要侧重于一个经济体可进行国际交易部分的经济总量对比, 而购买力平价则主要立足于一个单一的经济体的总量对比。本文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主要是为了展示亚洲内部格局的变化。此外,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经济力量对比应该更加重视存量, 而不是流量性质的 GDP。

占比将从 1980 年的 11.7% 升至 2019 年的 25.6%，南亚占比将从 1980 年的 4.1% 升至 2019 年的 9.4%，可以说亚洲 GDP 占世界比重的上升很大程度上缘于东亚和南亚的上升。但从四个区域占亚洲内部的比重来看，格局基本维持稳定，东亚占比将从 1980 年的 60.3% 缓慢升至 2019 年的 61%、南亚占比将从 21.3% 升至 22.4%、东南亚将从 18.4% 降至 14.9%，而中亚将从 1992 年的 2.3% 降至 2019 年的 1.7%。鉴于中国处在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包围之中，如果将中国大陆单独列为一个区域，那么过去 30 多年来亚洲经济体的内部平衡关系就显示出另一幅图景（图-1）。1980 年，不包括中国大陆的东亚占亚洲 GDP 总量的 48.2%，其中日本一国占 40.4%，而中国大陆单独占比为 12.1%，落后于南亚的 21.3% 和东南亚的 18.4%，1988 年中国占比超过东南亚，1993 年中国占比超过南亚，1999 年中国占比超过日本，达到 25.9%，日本当年为 24.6%。2012 年，中国占比达到 40.8%，已经超过 1980 年日本在亚洲的经济地位，而这一年不包括中国的东亚占比即将跌破 20%。预计到 2019 年，中国占比为 44.6%，而东亚占比为 16.4%。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的快速赶超起步于 1992 年前后，而亚洲地缘经济重心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力量对比以及如何如何在区域上定位中国。鉴于日本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的长期趋势不断下降，那么亚洲地缘经济重心与中国的战略布局紧密相关，中国地缘经济重心移动很可能带动整个亚洲地缘经济重心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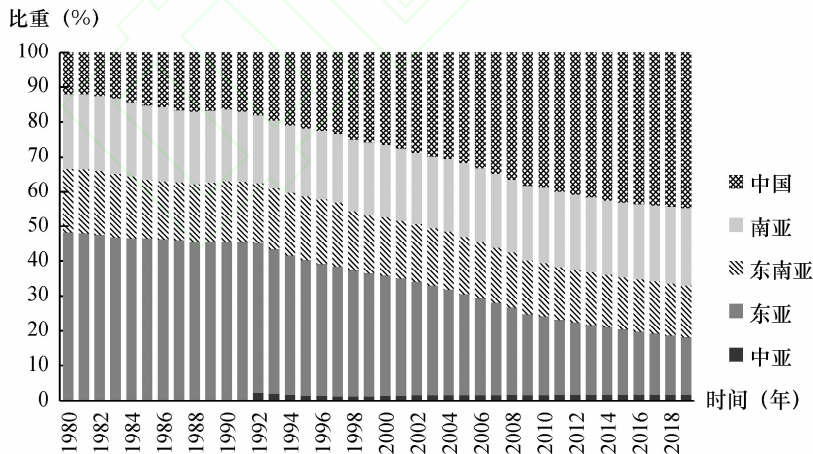


图-1 亚洲四个区域与中国占亚洲 GDP 比重的演变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IMF 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整理。

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主推出的“ACI”概念反映出亚洲经济重心从东亚转向

亚洲中南部的变迁。^① ACI 是东盟 (ASEAN)、中国 (China) 和印度 (India) 三个经济体首字母的缩写。据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 2014 年联合发布的《中国、东盟与印度：伟大的转变》报告，按市场汇率计算，ACI 占全球 GDP 的比重将从 2010 年的 15.6% 增至 2030 年的 28.8%，而日本将从 2010 年的 8.8% 降至 2030 年的 5.4%。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ACI 占全球 GDP 的比重将从 2010 年的 23.6% 增至 2030 年的 39.4%，而日本将从 2010 年的 5.9% 降至 2030 年的 3.2%。^②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尽管这些特大型和富有活力的发展中经济体没有形成任何特定的制度集团，但它们享有共同的边界、机遇和挑战。如果它们能够管理重要的挑战和风险，那么 ACI 经济体就有一个‘伟大的转变’。”^③ 如果东盟、中国和印度未来引领亚洲的发展，那么亚洲未来的格局将由 ACI 主导，这与 19 世纪后期开始并在整个 20 世纪由日本主导亚洲经济发展的格局是非常不同的。ACI 经济势力的上升将给地区和全球带来新的地缘政治考验，中印在推动亚洲和平与合作中将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需要从“防御性主权”转变为“负责任主权”。^④ 然而，值得中国重视的是，ACI 这一概念背后潜藏着美日地缘政治观念。当前，美日政策界日益把印度洋与西太平洋捆绑在一起谈论亚洲未来的海上安全挑战。美国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驻防海军陆战队，在澳大利亚位于印度洋的科科斯岛上建立军事设施，从根本上是为了预防中国在印度洋势力的崛起。可以说，美国亚太同盟体系正以一种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周边地带。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世界看到亚洲军费开支持续上升，大肆宣扬亚洲军费开支总额超过欧洲意味着一场亚洲军备竞赛。^⑤ 从西方一贯秉持的均势地缘政治思维来看，在西方之外崛起的军事力量中心的确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正如康灿雄指出的，按照军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来衡量，东亚地区的军事开支为 25 年来的低点，是冷战期间开支水平的近一半。2002 年以来，东

① 2010 年 10 月，ADB 在东京举办了该项目的起步会。2011 年 5 月，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启动了研究项目“关键新兴经济体——东盟、中国和印度，在塑造平衡、可持续和活力亚洲中的作用”的技术评估工作会议。8 月中旬，ADB 在新德里举行第二次技术工作会议。10 月，ADB 联合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ACI 崛起对全球的意义”国际研讨会。

② Asian Development Bank/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ASEAN, PRC, and India: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oky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2014, p. 28 Table 2. 1, p. 29 Table 2. 2.

③ *Ibid.*, p. xi.

④ C. Raja Mohan, “Emerging Geopolitical Trends and Security i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dia (ACI) Region”, *ADBI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12, March 2013,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⑤ Myra Macdonald, “Asia’s Defense Spending Overtakes Europe’s: IISS”, March 14,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3/14/us-security-military-iiss-idUSBRE92D0EL20130314>; Carola Hoyos, “Asian Military Spending on the Rise”, February 6, 2014, <http://www.ft.com/cms/s/0/af1000e8-8e89-11e3-98c6-00144feab7de.html>.

亚主要国家的军费开支比拉美国家平均少 50%。东亚（不包括中国）年均军费开支增长 4%，而拉丁美洲国家为 6%。^① 对亚洲国家自身而言，需注意亚洲内部的军费支配比是否发生了迁移。

如果将中国作为一个东亚国家来定位，那么从 1992 年到 2013 年的 22 年间，亚洲四个区域的军费占比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依据 SIPRI 提供的数据，^② 1993 年，中亚、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占比分别为 0.2%、76.8%、10.7% 和 12.5%，2013 年则分别为 0.5%、74%、9.4% 和 15.8%，四个区域占比大体稳定。相较而言，1993 年是东亚军费开支占亚洲比重最高的年份，最低年份出现在 2010 年，为 71.6%，而南亚在这一年达到历史高点 18.7%。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东亚占比的平均值为 73.9%，东南亚为 10%，南亚为 15.7%。22 年来，东亚军费年均开支占到亚洲的四分之三，亚洲四个区域的军事开支相对份额并未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军事实力在四个区域的分布是稳定的。

与判断经济权力在亚洲内部的变迁一样，中国属于哪一个区域将决定性地影响四个区域之间的军事力量分布。如果将中国单独列为一个板块，那么 1993 年以来亚洲军事实力在五个板块的分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94 年，不包括中国的东亚军费开支占比达到历史峰值 66.2%，此后基本一路下滑至 2013 年的 24.4%，而中国占比则从 1994 年的历史低点 9.5% 升至 2013 年的 49.5%。因此，过去 22 年亚洲军事力量格局最大的变化出现在东亚，简单而言是中国上升、日本下降。日本的历史峰值同样出现在 1994 年，占比为 42.1%，2013 年降至 12.8%，几乎等于 1993 年中国在亚洲的占比。不包括中国的东亚，其占比于 2002 年跌破 50%，从逻辑上讲，自此以后中国的区域属性将决定性地影响区域间原有的军事实力分布格局。

亚洲军事实力分布的变迁比经济领域中日力量转换来得更复杂一些，从东部往西移动的态势更明显（图-2）。1994 年，亚洲军事支出前六强依次是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印度和新加坡。换句话说，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盟友、准盟友牢牢把握着亚洲的军事威慑力量。2014 年，排名将是中国大陆、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美国在东亚的驻军主要在韩日两国，韩日两国的地位变迁反映出东亚的衰落。1994 年，韩日两国的军费开支合计占比为 54.9%，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下降，但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出现在 2001 年，两国合计占比从 2000 年的 50.9% 跌至 2001 年的 45.2%，且于 2007 年被

^① David C. Kang, "A Looming Arms Race in East Asia?" *National Interest*, May 14,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looming-arms-race-east-asia-10461>.

^② 世界银行提供的各国军费开支数据由该研究所提供。需要注意的是，该研究所承认它给出的中国数据是一个估计值，该数据有所夸大。另外，该数据库没有朝鲜的军费支出数据。

中国超过。与此同时，南亚的军事支出大国印度，其占比从 1992 年的 9% 增至 2013 年的 12.5%，1998 年略微超过韩国后，两国占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十分接近，直至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显著拉开差距。2010 年，印度占比达到 15.4%，而韩国只有 9.2%。东南亚的新加坡，其占比尽管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其地位相对于台湾地区明显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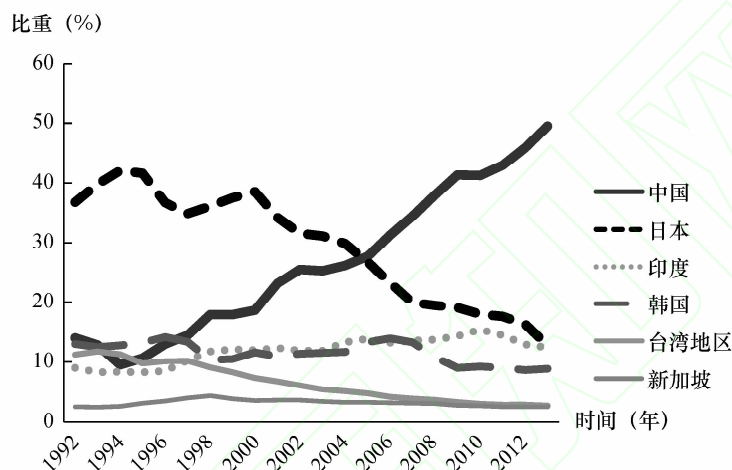


图-2 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军事开支占亚洲比重的变迁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网站提供的数据计算。

由于印度的军费支出大幅度上涨，长期以来作为心脏地带的东北亚的地位逐渐下降，军事力量在亚洲的分布正缓慢发生从东北亚向西南亚的偏移。2013 年印度军费开支非常接近日本（相差 12 亿美元），2014 年印度的军费肯定超过日本。这预示着一个转折点，即亚洲的军费支出两强不再是 90 年代的日韩和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日，而是中印。按照印度今后的经济规模和其偏向海洋的战略部署，亚洲的军费开支重心偏移还将加速。印度在亚洲军事战略地位上升，某种程度上推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提议将印度纳入其“印太”战略布局。在安倍晋三第一任期内，日本政府就正式提出了“民主菱形”国家联合政策。

由于中印发展迅速，亚洲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权力增长极，对亚洲自身而言具有超越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崛起国的首要任务是判断国际环境是否有利于其崛起，在塑造良好的周边关系的同时，还要稳定与霸权国的关系，其地缘政治挑战具有双重特性。从精神气质上看，比较接近于马汉时代的美国崛起，而与麦金德如何保持英国霸权地位、防止崛起之后的大国衰落有所不同。但在霸权国美国看来，中国则具有第一层次意义上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即该区域的崛起构成了对美国权势的最主要挑战，而哪些区域以及哪些行为关系能构成第二层

次意义上的地缘重要性，则取决于这些区域和中国权力中心的关系，以及美国如何研判这些地缘政治关系。

美国显然已经将亚洲大陆与西太平洋、印度洋衔接的一片区域视作其维持霸权所必须管控的“心脏地带”，韩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都属于这一区域，用斯皮克曼的术语是“边缘地带”。斯皮克曼的解决方案是在这一区域设置基地，而再平衡战略在军事上实施前沿部署也位于这一区域。问题在于，随着中印崛起带动亚洲地缘中心的偏移，特别是中国的亚洲地缘新布局，这一边缘地带本身已经不足以抗衡新势力的崛起。正如有论者指出，美国政府不断使用麦金德构建的“心脏地带”概念统领其战略，是有意忽略“统治北美就能统治世界”这一根本的地缘政治事实。^①从另一方面讲，对于英美霸权而言，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外部而不是社会内部，这是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模式得以盛行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的亚洲地缘新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出口导向战略融入东亚分工体系，表现在沿海省份快速的经济增长。但中国的持续增长给国际体系带来的地缘政治冲击，却不同于美国体系中的一些国家和经济体。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在主权上从属于美国，这些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本质上增强了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能力，而崛起的中国则被认为是挑战者。^②同样的经济增长，因政治原因带来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影响。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果美国改变其地缘政治部署，特别是围绕“印太”构建遏制中国崛起的防御圈，中国权力增长的外部基础能否通过在亚洲区域内的调整继续巩固？

中国在塑造地缘政治经济方面的主要策略是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意在破除崛起国和守成国的争霸逻辑。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中国不承认国强必霸的逻辑，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来塑造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自2013年6月习近平会晤奥巴马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后，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发展的热情与信心有所下降，特别是俄欧关系因乌克兰危机陷入僵局、中俄关系因4000亿美元天然气大单升温后，美国正在逐渐丧失对欧亚地缘政治格

^① Christopher J. Fettweis, “Sir Halford Mackinder, Geopolitics, and Policymaking in the 21st Century”, *Parameters*, Vol. 30, No. 2, Summer 2000, p. 66.

^② Baldev Raj Nayar, “The Geopolitics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China Report*, Vol. 40, No. 1, 2004, pp. 29-30.

局的控制权，加大了对中国的地缘压力。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扩展，西太平洋区域的国家呈现出从北到南逐渐向中国靠拢的态势，中国权力的影响力也随距离而逐渐缩小。^① 这一结论的政策启示是，美国可以花费较少成本拉拢海上亚洲的相关国家，但对于地理上靠近中国的国家难度较大。2014年10月，美国、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备忘录签署仪式，而印度则支持中国的这一倡议，成为创始成员国之一。韩国、澳大利亚缺席被广泛解读为美国施压的结果，美国同盟体系的存在对于维系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优势不可或缺。11月25日，印尼佐科政府审时度势，宣布签署筹建 AIIB 备忘录，成为第22个创始成员。

如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受阻，中国在亚洲地缘政治经济中的作为是否可行、可靠，还能不能有所作为、奋发进取？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以争霸为主旨的麦金德式的思考有助于理解美国战略，但对崛起国而言是不够的。亚洲的地缘政治变革首先源于中印自身的发展路径调整，而不是通过外部关系的地缘政治运作实现的，尽管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地缘政治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但立足于国内的发展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立足于亚洲崛起思考中国的地缘政治布局是摆脱美国压力的一个思路。美国秉持麦金德式的地缘政治思路构建地缘平衡，本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对外部力量崛起的悲观看法。20世纪后半期亚洲的经济崛起为中国的重新定位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世纪末开始，亚洲的经济和军费支出格局都在从美国同盟体系的韩日向 ACI 国家转移。从中国自身来看，经济重心也在发生偏移，尽管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西部地区的权重有所上升。按照中国东中西部的划分原则，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占比从2004年的59.2%降至2013年的55.4%，而中部地区占比从23.5%升至24.6%，西部地区从17.2%升至20%。在进出口金额比重方面，东部占比降至2013年的66.6%。^② 中国的经济重心仍然在东部，但十年来东部的地位有所下降，中西部占比上升。特别是西部的占比上升快于中部地区，增速是中部地区的两倍。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产生了实质性结果。当然，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崛起之时其国内重心也长期在东部地区，但美国的地缘战略最终不得不考虑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力量发展，特别是加州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新亚洲地缘政治经济

^① Robert S. Ross,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al Security Order", *Orbis*, Vol. 54, No. 4, 2010, pp. 525-545.

^②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

图景既立足于外部现实，也有深厚的国内基础。

从综合实力对比、可操作性方面来看，中国最富有创造力的外交理念创新仍然是在周边地区。新一届领导人对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有某种比较系统的论述。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经济理念和方案，不仅要具备较为扎实的国内政治基础，也要准确把握周边发展的新态势，特别是抓住周边社会经济和安全战略方面的共同利益。在引领周边地区安全形势时，中央的策略是以共同发展为核心理念，以地区安全新架构为制度框架，以“一带一路”为基本手段，以中国稳步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为根本保障。

第一，提升周边在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最显著的政治信号是，2013年10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首先召开周边工作座谈会。在中国政治议程中，三中全会具有定标作用，被各界评价为里程碑式的变化，提出了市场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种新倡议综合了国内和国际局势，特别是周边的发展态势。在国内方面，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龙头的新型开放模式加速推进。在周边地区，美日同盟进一步巩固，并抓紧利用 TPP 分化中国推动的亚洲区域一体化。中国领导人出访东南亚，美国总统奥巴马缺席 APEC 会议，这一对比震动了东南亚地区，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再度面临调整，为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注入了新因素。由于中国处于亚洲的中心位置，随着周边在中国国内政治议程中地位上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地缘视野随之更新，中国的经济重心略向西移，政治视野则更大幅度往西偏移，处于中心地位的中国更具实质性内涵。例如，2014年6月上旬出台的长江经济带，其目的之一是“形成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互动，打造新的经济支撑带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①

第二，构建亚洲安全新架构。有关亚洲安全新架构的相关论述，最早可能出现在2013年4月的亚洲博鳌论坛，当时习近平提出不容许“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已经隐含着警告区域外势力不要干预亚洲安全的想法。^② 2013年10月，李克强在出席第1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时首次使用了“安全架构”一词，希望与东南亚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地区安全的制度化发展态势得到明确阐述。^③ 2014年5月，在亚信峰会第四次首脑会议上，中国建议，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亚信的基础上

^①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长江经济带》，新华网，2014年6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11/c_1111097481.htm。

^②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31页。

^③ 李克强：《李克强总理在第16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3年10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10/c_125503937.htm。

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未来具体的机构设置包括亚信秘书处的功能完善、成员国防务磋商机制、落实监督行动小组、亚洲执法安全合作论坛、亚洲安全应急中心、亚洲文化对话大会等。习近平指出，实现这种安全新架构应“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种亚洲安全新架构主要立足于本地区，排斥区域外力量参与，为此习近平强调“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① 国际舆论则认为，这是中国人提出的亚洲版门罗主义，意在排除区域外势力的干预，特别是美国的干预。^② 美国自认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但难以断言是一个亚洲国家。因此，当中国在安全治理领域提倡“亚洲”而不是“亚太”时，被认为在相当大程度上否定了美国参与亚洲安全事务的合法性。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参加亚信峰会的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和代表主要来自中国的西部和西南部邻国，尤其是能源大国，比如伊朗、卡塔尔。而东亚的日本、南太的澳大利亚都没有参加。这意味着，中国的亚洲安全新架构，核心是亚欧大陆权势格局变迁，是中国应对西部“三股势力”的一个重大举措，陆权的考量特别突出，当然也反映出中国对北约这一安全模式的思考，以及未来通过互联互通对话欧洲安全机制的可能性。

第三，构建以“一带一路”与两个经济走廊为代表的“井字形”地缘经济合作新态势。2013年9月，习近平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时提出复兴“古丝绸之路”，10月在印尼国会演讲时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中巴经济走廊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则是李克强在出访巴基斯坦、印度时提出来的，比“一带一路”更具针对性，旨在强化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次区域合作，这两个经济走廊在后续的双边对话中也逐渐融入了“一带一路”建设。而“一带一路”这一规划的明显特征是，中国与相关国家探讨设立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对接发展战略，推动互联互通，以油气、资源、电力合作拓展经济一体化新模式。当然，这一地缘经济新态势也面临挑战。如果日本加入这个“井字形”架构，

^①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54—356页。

^② Sukjoon Yoon, “Xi Jinping’s ‘Monroe Doctrine’: Rebuilding the Middle Kingdom Order?” *Eurasia Review*, May 29, 2014, <http://www.eurasiareview.com/29052014-xi-jinpings-monroe-doctrine-rebuilding-middle-kingdom-order-analysis/>; Seiichiro Takagi, “Xi Jinping’s New Asia Security Concept”, *AJISS-Commentary*, No. 204, August 27, 2014, The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Patrick Mendis, “China Follows America’s Monroe Doctrine as Obama Pursues a Policy of Ambiguity”, *Minnpost*, May 21, 2014, <http://www.minnpost.com/community-voices/2014/05/china-follows-americas-monroe-doctrine-obama-pursues-policy-ambiguity>.

那么中国的地缘经济新布局将呈现为圈型，但中日对峙短期来看难以结束，中国的新地缘经济战略在东海方向上存在一个对峙点。在西南方向，印度的莫迪政府更加注重与中国发展关系，中印关系发展有可能降低1962年因中印边界战争引发的猜疑，重新寻求20世纪50年代共同开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对新亚洲的期待。9月，习近平在出访印度时表示，“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①这一中印关系定位，实际上是要协调亚洲两个增长极在各个层次的地缘政治关系。

第四，实现中国“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是筑造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新格局的保障。中国的总体目标是到2021年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体系，包括初步完成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2049年实现人均收入的中等国家化。目前的亚洲地缘政治经济变化只是这一长远目标的一个阶段。比较而言，过去十年中国国力的变化速度、规模超过国际体系的变革，中国崛起的经济体量的冲击力尤为迅猛。中国与国际体系这两种变革速度是推动中国实施新亚洲地缘战略的根本动力，如果未来十年较以往10%的速度下滑四分之一，亦即在7.5%的新增长常态下，中国还能不能保持过去十年累积的变革能力？中国新亚洲地缘战略或者说塑造亚洲地缘战略的新视野，立足的国内基础与十年前大为不同。从国际层面来看，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力量、治理模式、军事威慑等方面，西方社会都面临着被挑战的态势，也即以往的国际秩序规范正处于转型之中，而在国际秩序发生变革时进行新地缘安排比较可行。

五、超越对抗性地缘政治思维

自19世纪后期欧洲诞生地缘政治理论体系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防御性学说基本上战胜了德国的进攻性学说，而亚洲无疑是西方世界实践这两种理论体系的舞台，但亚洲国家本身并不处于舞台中心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麦金德关于欧洲和亚洲的权势因欧亚大陆地位上升而逆转的预言并没有在20世纪实现。20世纪后半期，美国遏制苏联扩张，进一步说明英美地缘政治学说的指导思想是均势，目的是防止出现挑战霸主地位的地区以及重要地区内强国的崛起。但美苏对抗也带动亚洲地缘政治发生变革，表现在以日本为首的美国亚太盟国体系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发展。中国通过发展与海洋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借助亚太地区体系寻求经济增长的空间。

^① 习近平：《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新华网，2014年9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19/c_1112539621.htm。

中国崛起是 20 世纪后半期东亚崛起的继续，而当前亚洲的地缘政治经济重心已经偏离了美国定义的东亚。东亚崛起表明，19 世纪以来相互分离的次区域治理模式，已经发展为一个能够进行产业升级和容纳地区外对抗性力量的整体。与 19 世纪分散在亚洲各个区域的次级治理体系不同，如今的亚洲地区一体化建立在各国工业化的基础上，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有了实质含义，损害他国利益最终也将引火烧身。21 世纪亚洲地缘重心的变迁意味着传统的东亚概念衰落，日本、韩国在亚洲的经济和安全影响力将让位于中国和印度的地缘影响。中印两国在历史上拥有各自主导的次区域体系，但都在西方入侵下崩溃，经历兴衰的两国在如何建构稳定的地区秩序方面拥有很多相同的看法，其代表性观点即 20 世纪 50 年代产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崛起与东亚的相对衰落被认为是美国地缘政治面临的挑战。20 世纪后半期美国处理东亚事务的基础之一，是其亚太盟友在力量对比上优于中国。然而中国崛起改变了东亚的力量对比，美国的双边制度框架能够约束其同盟体系，却难以管控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奥巴马政府力推再平衡战略，其核心是阻止东亚的中国确立中心地位，延缓同盟体系的衰落。美国试图联合印度，构筑地域广阔的“印太安全体系”，将中国力量优势约束在东亚大陆一侧。美国之所以如此运作地缘战略，其依托是亚太盟友这些支轴国家，美国决策层深受麦金德防御性地缘政治学说的影响，认为有必要构建亚太海洋力量来管控大陆力量向海外的拓展。

但美国强化双边同盟体系、提升支轴国家地位的战略，并没能阻止中国回归亚洲大陆的中心位置，反而进一步加速了东亚的相对衰落。关键在于，美国将中国定位在东亚，维持美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加剧了日本的国家定位难题，日本难以协调作为美国体系一员与亚洲一员的关系。作为美国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日本势必要承担美国管控中国的任务，与此同时，日本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又要加强与亚洲增长极的交往，特别是在经济利益上日本难以脱离亚洲的新增长极。美国也面临类似难题，如果日本加速发展与亚洲新增长极的关系，尽管能增强这一支轴国家的地位，但同时也在增强亚洲新增长极的影响力，这两种力量增长加总之后如何影响美国国家利益还难以断言。因此，美国及其同盟体系有必要调整其地缘政治思维，降低对 20 世纪地缘政治运作经验的依赖度，以开放姿态迎接亚洲的全面崛起。

作为亚洲新增长极的重要一员，中国也要认真考虑弱小邻国的地缘认知。历史上朝贡秩序的基础是农业经济模式以及中国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国家间实力对比几乎没有变化，规范国家间关系的准则是文化体系，地区关系总体和平。这种和平局势对中国的战略文化有着深远影响，决策层相信中国历史上处

理周边国家的经验具有合法性，因而在制定落实当前的对外战略中可以引以为鉴。但对二战后新独立的一批亚洲民族国家而言，盛行的地缘政治思维是英美模式，这种模式有两项经验总结：一是西方历史上的国强必霸逻辑，二是对19世纪后期以来日本武力崛起的否定。因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英美地缘政治模式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逻辑中，发现、培育和扩展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国际关系逻辑，让周边国家逐步相信中国的崛起有利于地区稳定和各国发展。

客观上，中国与地区内国家间的权力差距越来越大，周边邻国的心理落差也会持续增强，在某些问题上的反应有时更加敏感和激进。对此除了继续强调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不认同用“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方式处理国家间关系，也要真正从国内社会层面降低用武力解决纷争的心理预期，培育心心相印的关系。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增长极，亚洲的地缘格局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提出用“亲、诚、惠、容”的理念处理周边关系，强调义与利平衡发展，并且将国内的“中国梦”扩展为“亚太梦想”，寻求以更加长远的眼光看待一时的得失。说到底，理念和价值观比某一时的政策更具生命力和传播效应，对社会力量的渗透更为深远。

为了继续推进地区一体化、夯实地区安全的基础，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方案，积极支持地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工程，在更大范围、更大产业规模上深化双边互利合作，继续提升亚洲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发出亚洲国家在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独特声音。中国以对接周边国家的发展作为核心，推进“一带一路”新合作倡议，为中国政府的外交行为和本国发展道路拓展了合法性。唤醒与周边邻国共同的历史记忆，挖掘彼此之间更多的文化关联和人文纽带，有助于塑造新的地区认同。复兴海陆“丝绸之路”，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地缘政治身份的重新定义，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融入现代国际体系的后发国家，中国不像东亚的日本、“四小龙”那样，仅满足于在阶梯上追随美国，而是要从根本上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地位，创造新的发展模式和文明。

中国的亚洲地缘视野立足于共同发展，而不是共同威胁。中国强调国家战略目标的动态性和多元性，争取霸权地位并不是中国推行新亚洲战略的核心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地缘战略显然超越了麦金德式的、以均势为核心的地缘政治诉求。

（责任编辑：李 丹）